



维护《巴黎协定》工作方案进程：机遇与挑战

时间：2017年8月30日 15:00 - 17:00

地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层报告厅

主持人：

齐晔，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嘉宾：

Jo Tyndall，《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APA）联合主席，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气候变化执行大使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齐晔：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重大成就和联合国上百个成员国共同努力的成果；然而在1994年公约生效以后，很久没有让各国一致满意的框架性协议来继承，相隔甚久的京都议定书和哥本哈根协议也饱受质疑与争议；一直到2015年的《巴黎协定》——作为一个由发达国家领导、以多边合作为特征的全球气候治理方案——才在广泛的共识下令人满意地通过了；不幸的是，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退出《巴黎协定》，使人对这一方案的进程感到悲观、进一步对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道路这一方式本身产生了质疑。这也对我们《巴黎协定》的未来造成了很大挑战，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挑战。对于联合国主导应对气候变化的这种路径，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道路，有的人则有不同的看法。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来了《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的联合主席 Jo Tyndall，这个特设工作组简称叫 APA。Jo 也是新西兰气候变化执行大使。在担任这个职务之前，她其实在气候变化方面做过很多工作。从2010年到2016年，也就是2010年7月份哥本哈根大会，然后一直到《巴黎协定》签署，她

一直都是联合国的气候谈判代表团团长。在那之后，她又重新担任新西兰的气候变化执行大使。而且她也是特设工作组的联合主席，她也是西欧及其他国家区域小组的代表，所以她对于《巴黎协定》签署的整个过程以及取得的进展都非常了解。今天的对话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会请大使来做一个主旨发言，在之后我们会请张海滨教授，他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北大国际组织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教授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对于国际组织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气候变化的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那么我就不再占用大家更多的时间，现在有请大使来发言。

Jo Tyndall: 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今天在这里发言，我刚刚知道这实际上也是大学暑假的最后一周，同学们假期当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讨论，说明大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感谢大家。很高兴我能够来到北京，而且今天天气非常好，北京看起来充满了绿色，也非常的漂亮。来到这里讲气候问题，也非常应景。我曾经参加了在巴黎进行的 COP21 会议，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是辛勤工作的一个最终的历史性的成果。而且它所带来的框架确实是全球努力，涵盖了各个方面，包括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执行方面的融资的安排。《巴黎协定》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大家有着非常强的政治意愿，有着美国和中国强烈的政治意愿。尽管美国现在决定退出《巴黎协定》，但是我还是要这么说。大家仍然表示将继续支持《巴黎协定》。有几个国家已经批准了《巴黎协定》、已经有超过 160 个国家，他们对于《巴黎协定》的承诺并没有改变。我们并没有看到所谓的这种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就是美国退出之后，会有其他国家也陆续退出。新西兰实际上就是不断地重申我们对于《巴黎协定》的承诺，以及我们制定的 2030 年的框架目标。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要到 2020 年的十一月才会正式生效。对美国来说，重新回到《巴黎协定》的大门还是敞开的，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另外美国也表示会进一步参与联合国的气候变化方面的谈判，以后全球的一些行动他仍然可以有机会参与，对于新西兰来说，对于全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我们也非常欢迎美国在以后做出重返《巴黎协定》这样的决定。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中国表示出了非常明显的领导力。采取了对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行动。作为特设工作组的联合主席，我实际上是希望我们能够有非常及时有效的一个工作成

果，要能够实现这一点呢，中国就必须表现出在国际谈判当中同样的这种领导力。所以我们也正在努力地实现一些和《巴黎协定》一致的结构性的成果，我非常赞赏中国在这些谈判当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我想中国以后肯定还会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特设工作组有着具有技术性的一个工作安排，这是在 2018 年 11 月之前我们的一个工作安排。大家要知道，实际上《巴黎协定》只是非常宏观的一个框架性的文件，是一个总体性的、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性文件。同时它的成果实际上要比这个协定本身的长度翻了一番，有 20 多页，有一系列关于各国的这种决定，比如说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程序模式，这实际上就是把《巴黎协定》的框架进一步丰富化了，这肯定是必须的。因为只有有了这些具体的行动安排才能够使得巴黎协定真正有效。所以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非常复杂。而且我们在 195 个国家当中谈判，实际上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全球性的谈判，所有的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想要保护。为了能够取得进展，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代表团之间要彼此相互沟通，而不能仅仅说在谈判组内部，而是要在谈判代表团之间，各国之间来进行沟通。这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也是一个可以管理的过程。

特设工作组是有很多的工作意向，包括减缓透明，包括全球的一些适应性的工作，还有和 UNFCCC 相关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关于市场，关于融资安排等等。这些都要在明年波兰 COP24 会议上做到位。同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意向的事在谈判过程中。有的时候大家还没有完全地理解相关的意向，或者是他们会考虑到各自的担忧，各自的一些优先事项，认为没有充分体现在磋商过程中。有一首歌，或者是一个民谣，就是说我们很多的骨节之间是相连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优先事项，要讨论先发生什么，要在哪儿发生，所有的事情都要向前推动。我和其他的一些合作的主席的重点也就是让大家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推动我们的工作，因为这种联系之间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解决办法。否则的话，我们的成果可能是不合适的，或者是相互矛盾的。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困境，那我们要提供一些指导或者是一些解决办法，我们可以推出一些指南，这样的话，能够把大家的重点关注点都集中到最重要的事项上。而且有书面的形式来给大家提出一些提示，而且要有时间限，并且这个指南它的性质要很明确，而且要非常的关键。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或者是方向

错误，这可能会使整个的谈判更加延迟，我们必须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设定正确的方向，同时我们也要记住我们在桌上的这份文件，可能会让人们去思考他们的一些相关利益，他们想把自身的利益加入到这个文件中去。那么在之前，就碰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有一些大家没有达成共识的一些事项，或者是一些旁支的事项，可能就会导致一些激烈的讨论，最后使我们偏离了讨论的重点，也无法实现我们当初设定的目标。

我们的指南草案现在是正在筹备的过程中，它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所以作为联合主席我们是希望会员能够以正式的方式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会积极地建设性地并且组织一些非正式的研讨会和有关各方进行沟通。在明年会召开一系列的会议，我还想说实际上这是一个技术性的过程，我们并不是说在重新就《巴黎协定》进行磋商或者谈判。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巴黎协定》预期的目标，实际上也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南。也就是说我们能做到什么、不能够做到什么，我们应该在最开始的指南中明确这一点，而且不断地回应最重要的问题，并且把一些棘手的问题拿到谈判桌前来进行讨论。而且希望能够是一致性地来进行磋商。但是，我们也并不是非常天真的。《巴黎协定》本身协调了各方的利益，但是有些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肯定还是会就一些问题重新开展谈判，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并很好的管理。到 2018 年要想成功地召开 COP24 次会议的话，我们必须要把一些未决的事项拿出来再进行讨论，我是保持乐观的，我觉得特设工作组的工作不是从 0 开始，它涉及到繁重的任务，而且不光涉及到用 UNFCCC，还涉及到其他的很多机构、很多的智库，还有 OECD 组织等等，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涉及的观点也是非常的繁杂的。同时我觉得个体——单个的个人或机构，是不可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我们是在概念的层面来遵循 UNFCCC，同时我们也在进行从概念到具体的解决办法的一种过渡，而且我们鼓励人们能够就具体的事项来提交他们的建议。就是在他们看来什么样的指南是最恰当的，我觉得这种参与度，以及这种参与的意愿是令我们深受鼓舞的。我们的特设工作会如果不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不是对 195 个会员开放的话，那么它是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的，但是我们也达成了一致，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他们的观点，他们都可以明确地清楚地来表达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说别人代表他们的利益，

或者是由其他的机构来阐述他们的观点。我也是了解整个的决策的过程，我觉得如果你要想找到解决办法的话，那你必须要知道背后的驱动力量是什么，也就是有哪些观点。有哪些需求，有哪些能做的，不能做的，有哪些了解，要了解各个国家的关切，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行得通的解决办法，所以这就是你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找到解决办法。

同时，兼顾到其他国家的关切也是必要的。我觉得《巴黎协定》它确实是一个范本，是二十一世纪的这种多元协定的一种代表，它是基于互信、基于透明的一种灵活性的协定，而且它也是尊重各国的主权，各国的自觉，以及NDC，各国所决定的这种贡献。同时他也考虑到了多元性，考虑到各个国家的能力，和他们的优势，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模式，他是非常灵活的，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我们明确的一些参数内是有灵活性的，那么我们说他是有法律的这种约束力的，他是透明的，而且是我们说第一个特点就是灵活性，第二点就是它是不断地改进的，它不是说我们最开始就期待是完美无缺，而是说我们认识到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尽可能的来建立这个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完善。随着你更加有自信，你的技术在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越来越大，那么成效会更好，第三个特点他是渐进式的自信，也就是说各个国家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最开始的目标是什么，但是同时他们的这种承诺会随着实力的增长不断地来提升。最后，《巴黎协定》核心的特点是，它不是强制性的，它是支持各个国家来进行广泛的参与。由于《巴黎协定》是在每一个阶段都是进行了完美的规划，因此它可以使我们有一个强劲的、并且是可信的一种指南。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也知道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阶段，各个会员、各个成员国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来落实《巴黎协定》。我就讲到这儿，我们之后还有专家研讨，还会回答大家的问题，感谢大家的倾听，谢谢。

齐晔：非常感谢，感谢您分享您的一种见解，那我想向各位听众介绍一下，Jo Tyndall女士是今天上午刚到，她从新西兰经过了漫长的旅途来到北京，我们掌声感谢她的这种付出和辛苦。您现在可以稍微地放松一下，喝一点水。我想向张教授提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北京大学也是为中国的气候变化代表团一直在提供建议，刚才Jo Tyndall大使也介绍了《巴黎协定》一些背景，张教授您能不能结合刚才Jo Tyndall大使的发言做一些回应。

张海滨：谢谢齐教授。我很荣幸有机会来参加今天的对话，每一次我碰到您的时候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十一年前 2006 年我们第一次在伯克利大学见面。当年也是第一届中美气候变化会议召开的时候。所以当时非常愉快，今天也非常高兴再次见到您。而且我也想感谢 Jo Tyndall 大使作出了非常富有洞见的发言，作为学者来说，我从您的发言里面学到了很多。特别是最近的一些新进展，有特设工作组所开展工作等等，让我们知道了关于协定指南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尽管这只是一个《巴黎协定》谈判的起点。那讲到这儿，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初步想法，都是关于《巴黎协定》的机会和挑战的。我讲的比较简短一些。我非常高兴听到 Jo Tyndall 大使对于气候变化谈判的未来充满信心，这也给予我们非常大的希望，我们是需要希望的，因为在过去一年里面出现的很多不确定的事件，正像齐教授所说的也包括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这是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方面的一件大事。在这儿我想，我带来了两份重要的报告。一份是联合国秘书长向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工作组所提交的一份报告，是上个月提交的。这实际上是最新的对于这方面进展的一个回顾，我给大家几个数字，我觉得非常重要，让我们能够了解一下现状。第一个数字就是去年 2016 年，全球变暖仍在继续，升温 1.1 度。第二个数据全球冰川的缩减达到了历史新高。第三点就是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达到了 400PPM，所以有了这些数字我的想法就是在读了这份报告之后，气候谈判方面在全球层次上面最大的挑战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我们人类行动的缓慢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那么再有，是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个报告，发达国家承诺在 2020 年以前拿出一千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这个数字方面的进展如何呢？现在只有一百亿美元已经筹集好了，所以说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发达国家必须要加紧筹资来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我觉得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关注这个问题的紧迫性。这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齐晔：好，非常感谢，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您跟我们分享的报告，特别是您讲到去年的测量的数据达到历史新高。而且我想我们今年北京的夏天也是非常的热，而且开始非常早，持续的时间也很长，温度也很高。其实我们只是从过去几天才开始看到了天气比较凉爽了，而之前很多天都非常炎热。另外，您也提到了海平面上升，还有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都已经达到了历史新

高，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不仅仅是人类面临的挑战，也是气候变化治理面临的挑战。我们在这儿实际上只过了 25 年而已，我们是从 25 年之前由联合国开始主导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在过去 25 年里，我们看到了《巴黎协定》所取得的成功，这值得庆祝的。但是同时后面看到历史新高这种升温，还有海平面的上升，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都达到历史新高。那么大使女士我就想请您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我们的学生来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大的一个差距，就是一方面我们在气候变化治理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另外一方面气候却变得越来越糟。

Jo Tyndall: 好。实际上您问我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我觉得首先我想接着张教授刚才讲的一点接着讲，就是气候融资。因为我想要对此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个路线图了，就是在去年的马拉喀什 COP 会议之前发布的，发达国家正在按照计划在 2020 年之前拿出一千亿美元，这个是集体作出的一个承诺。那么我要澄清一点，就是说融资不完全是说从公共资金当中筹资，它实际上包括不同的资金来源，既包括公共部门，也包括来自于私营部门的资金。这是对公共资金的一种放大，吸引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到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当中，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还有非常明显就是这个紧迫性，采取行动的紧迫性，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些数据，确实令人非常的警惕。气候变化其实就好像只是一个火车头，他在不断的加速，你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地让火车逐渐地减速，然后直至停下来。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其实已经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而且做了很多的努力。要改变，要实现能源的转型，然后减少排放。根据中国所做出的承诺，就是国家自主承诺贡献 NDC，中国是要在 2030 年才能够实现这些目标，但是要减少排放，实际上是需要很多时间的，比如说在新西兰，我们的排放还没有下降，这是因为我们一半的排放都是来自于农业生产，来自于畜牧行业，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技术解决方法能够使得我们种植粮食作物的时候不排出二氧化碳，那么这个粮食种植是会产生甲烷，然后排放到大气当中，所以实际上是有进展的，也有一些很积极的行动得到落实，但是是需要时间才能看到效果。另外还有我们也要记得美国的排放是在下降的，他们又恢复到了 94 年的排放水平，而且仍然在继续下降。所以我们是

希望的。但是呢，我们需要快速地采取行动，而且要有自己宏大的目标。那么《巴黎协定》就是很好的一个起点。

齐晔：两位都提到了气候融资，似乎两位对此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再进一步去深入地讲一讲这种行动和承诺之间的差距。张教授提到了发达国家在实现自己的一千亿美元气候变化融资的承诺上面做的还远远不够，那么 Jo Tyndall 大使是说去年在马拉喀什已经达成了一致吧，或者说达到了一个协议，就是要充分动员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资金，用于气候变化。我不知道张教授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

张海滨：实际上我一直都非常好奇就是公共和私人融资的角色，他们各自都是什么。我是到全球气候基金的秘书处，问他们公共融资和私人融资他们是不是一样重要呢？从资金的数量来讲，和私人融资相比，公共部门的融资只是很少的一个部分。但是他们告诉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息。他们说即使是公共融资的数量非常小，但是在初期，这个公共融资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这个作用会逐渐不那么重要，但是他们是一直在从努力从西方国家的政府那里进行融资，这个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所以我就在这儿想特别强调官方资金的重要性，就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这种公共融资在现在这个阶段，也就是整个起步阶段的重要性，因为这个阶段非常重要。

齐晔：您说的从（英文）所拿到的数字也是表明发达国家的资金是不足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拿出的数字金额很小，但是他们非常重要，因为时机，因为现在是《巴黎协定》的一个初步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公共资金、来自于政府的资金，就显得特别重要。我想请听众原谅我们，因为我们的讨论变得越来越技术性了。但是这确实是应该去讨论的，这也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就是钱的问题，我们需要钱来缓解气候变化，也需要钱去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对于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他们都需要资金来适应气候变化。Jo Tyndall 大使您刚才讲到说我们的钱是足够的，或者说至少我们是按照原来的承诺看到了进展，一千亿美元，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一千亿美元里面目前拿到的，或者说已经准备好的资金当中有多少是公共资金，因为这个信息非常重要。有多少是来自私人部门的，那么这投资比如说是

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或者是其他的领域，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让我们了解一下它的情况。

Jo Tyndall: 我想明确一下我谈到了发达国家已经步入了正轨到 2020 年实现一千亿美元的融资目标，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你如果你看路线图的文件的话，它有描述，也就是说我们要预测未来的融资规模，公共部门和其他私人部门筹集上来的这个资金的规模，到 2020 年应该是多少，这是一个前瞻性的文件，是到 2020 年，我们能够筹资这么多，我们现在已经步入了正轨，而且我们有自信到 2020，各个发达国家能够实现他们的承诺。我今天不是来讲公共融资的，我希望我没有记错，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的比例，那么公共融资的需求还是很高的，这个数字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怕我一说以后会有人引用我说的错误的数字，我的团队是不是现在可以告诉我一个数字呢，不行，所以我现在不能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确实是一个很大规模，很大比例的资金已经筹集上来。我们来看绿色债券市场，在几年前还没有，但现在它已经催生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规模，会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很大的支持。同时我们会知道投资的转型从过去棕色经济转向绿色经济的投资，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我给大家谈一谈新西兰的情况，不是说所有的公共资金都是进入到了 GCF，也就是绿色气候基金。它是直接通过双边的一些安排来实现的。那么对新西兰尤其如此。我们大部分的公共融资是融入到了具体的地区，也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小岛国，他们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他们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经济模式，并且是绿色经济的模式开发出来，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投资方向。

齐晔: 我觉得您刚才谈的非常重要，也就是 GCF 它只是一种工具，绿色气候基金，是其中的一种工具。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工具，新西兰包括其他的国家像挪威、印尼，比如三十亿美元的基金投入进来，就是避免滥砍滥伐。那么有一千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基金的规模，是用于了减排，是提高这种能源的效率。那么其中包括风能和太阳能的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也是一千亿。还有另外一千亿美元是用于了气候适应，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的是三千亿的规模，您能不能谈一谈气候融资的类型，有哪几种类型？发达国家他们的进展如何？

Jo Tyndall: 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地理解了您的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说，很多国家、大多数国家，除了最不发达国家之外，他们都投入了自身的一些资源，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也是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支持来适应气候变化，或者是减排。在很多的国家，国内投资的水平是很高的，比如说技术设施的投资。或者是投资节能和绿色能源，都是很普遍的。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这些投资之外，还有捐赠国的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这种南南合作的例子也在涌现出来。中国也是积极地参与了南南合作，所以我们的资金包括各种来源，各种出处。

齐晔: 我的问题实际上是取决于我们如何来考虑关于气候变化的不同的这种资金来源，那么我想说，确实有不同的融资的来源是和气候变化相关的。那么在座的两位你们的观点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一个是强调公共融资，另外一位是强调整体的融资和整体的投资是吗？

张海滨: 齐教授，实际上我并不是要批评任何一方，因为我们在谈未来的挑战，在谈气候谈判方面的挑战。我为什么提出了气候融资这个问题呢？是因为 GCF 是最重要的和《巴黎协定》相关的一种融资的工具。而发达国家要承诺要给出额外的资金，这里面这个“额外”是一个关键词，就是他们会追加投资来支持减排气候的减缓，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另外，奥巴马政府承诺投资三十亿美元，进入到 GCF 基金，而特朗普政府取消了这样的承诺，那么美国的承诺占到了整体基金承诺的 40%，也就是 40% 的 GCF 的融资是来自美国，现在特朗普政府说从今年 6 月 1 号我停止融资了，对于发展中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齐晔: 我觉得我们并不是批评任何一方，我们希望能够明确关于气候融资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为什么追着这个问题不放？是因为我看到你们两位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确，能够进行一些澄清，大使女士您能不能从您的视角来看一看，如果说气候融资步入正轨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是什么，比如说中国解振华部长他经常会就此发表观点，他确实在批评发达国家没有履行承诺，那么发展中国家批评发达国家没有履行承诺他们的依据是什么？

Jo Tyndall: 首先我想说 GCF 绿色气候基金，绿色气候基金还有很多的数额没有分配出去，我们说美国政府不会继续支持这个基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GCF 本身就不能运作了，它有资金，它也有它自己的网络，它会继续地来进行资金的分配。那么美国政府的态度的影响可能会使得 GCF 资金的整个的资金充盈的时间，或者是重新融资的这个时间要提前。那么我们还有 GEF，全球环境基金，它有自己的资金在注入的周期。所以美国的态度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不同的考虑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政治视角。我们必须要求同存异，但是从新西兰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气候融资的承诺是很强的，我们也是沿着正确的轨道来努力来实现 2020 年一千亿美元的这种规模，我们会从各种途径来进行筹资。

齐晔：那么在我们进行下一轮的问答之前，我想请大使女士来再回应一下，您在发言的时候，是作为特设工作组的联合主席的立场还是新西兰气候变化大使的立场？

Jo Tyndall：我觉得 APA 特设工作组并不把气候融资作为我们的一项工作事项，所以我肯定代表新西兰气候执行大使来回应这个问题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澄清。

提问环节

齐晔：您先介绍一下自己，然后提问。

问题 1：谢谢，我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根据一些研究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是谈到了 NDC 的这种情景，即使是从 NDC 的角度来看他们做的也不够，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判断这个国家是不是在现在 NDC 的这种制度下已经做的够了，或者是说做的不够？我们如何来增加这些国家的这种贡献，并且来实现目前的这种差异，或者是缺口。

齐晔：我觉得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 NDC 各国自己决定的这种贡献额和《巴黎协定》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的这种要求之间的差距，怎么去判断不同国家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行动还有做出的承诺够不够。

Jo Tyndall：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非常感谢您提出这个问题。我想要回答，APA 做的工作还是非常的恰当的，因为各国自主贡献，在《巴黎协定》之前就提出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指南，也没有规则，如果特设工作组能够成功

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制定出来指南和一些参数，并且如果这些参数得到执行，然后来代替 NDC，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到底这种贡献有多大，是什么。第二，其实就是说《巴黎协定》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机制，能够让各国去自己采取行动。我们的成员国其实是应该不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定更宏大的目标，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提出来的国家自主贡献要，就是说我们要接受这些 NDC 作为很好的一个各国提出的自主贡献，那其实也有很多国家也加入了这个巴黎协定制定了 NDC，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需要制定指南，还有一些参数，来真正地进一步明确《巴黎协定》。

齐晔：好，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听起来太宽松了，对于一些国家来说。那到底有没有法律约束力呢？如果说 NDC 得到了接受我们也知道各个国家确实是在不断地改进，但是对未来的承诺也是由各国自己来做出来的，那么是不是仍然具有这种法律约束力呢？

Jo Tyndall：法律约束力根据协定的条款来决定的，NDC 其实各国自主贡献本身在国际上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具有约束力的是《巴黎协定》对于透明度，还有问责的这种规定，或者说条款。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看到的，或者会看到的是这种同辈压力。我觉得大家也会看到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他们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比如说发达国家里的新西兰，很多国家他们的 NDC 都按他们开始考虑，他们的政策当中有哪些失误需要去改进，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很长的学习曲线要走。那么有发达国家这么去做了，那么各个国家才会越来越有信心进一步制定出来更宏大的目标。

齐晔：我想可能我们看到这个同辈压力在有些国家的压力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

问题 2：首先感谢大使女士，我叫豪维（音），我是来自苏世民学院的，我有两个问题，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大家进行的讨论。一方面我们谈判是非常灵活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来说又是带来了一些压力，所以我们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什么建议来减少这种不必要的压力，第二就是这种次国家的组织，那么他们在执行《巴黎协定》当中的作用，有没有这种地区性的次国家组织？

齐晔：你是苏世民学院的学生是吗？我想您是下周就会上我的课。好，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大使女士来回答。

Jo Tyndall：我觉得次国家组织他们非常重要，而且《巴黎协定》要成功的话就必须要让地方政府，还有私营部门，以及国家政府下面的各级政府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进程里。就是尽管他们并没有真正直接参加正式的谈判，没有参加每年的 COP 会议里，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确实是改变游戏规则的这样一种角色，我们看到像在新西兰，还有在其他国家肯定也是这样，您开始看到的是一个双向的信息，政府发出一个信息，就是政府做出了要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要提供一种政策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给私营部门。然后地方政府还有私营部门就在给政府发回这种反馈，就是说他们也在采取行动，而且非常认真的在对待这件事。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您看到有很多城市的市长，还有各州，比如像美国各州的州长他们都在不断重申自己对于可再生能源的目标的承诺，都在讲自己在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以确保排放水平不断下降。中国建立的这种国家碳排放交易制度，新西兰也非常关注，我们 08 年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排放交易制度，这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让新西兰可以实现我们的国际上的气候变化的承诺。

齐晔：新西兰的碳市场情况怎么样？您觉得它是否有效呢？

Jo Tyndall：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有效，一部分是因为碳单位的这种国际价格太低了，但是我们采取了几个行动，至少是暂时性的行动，就是我们把国际这个通道关闭了，那这样国内的碳价格就上升了。第二，就是政府完成了一个对于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评估，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它对于实现 2030 目标是不是有帮助，我想根据这个回顾也会让我们在之后采取一些改进措施。我想肯定听众里面会有一些人对于碳市场非常感兴趣，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也乐意回答。

齐晔：您在之前的问题里面就提到了次国家组织，那么非政府组织他们在《巴黎协定》的制定以及执行过程当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听到好几个非政府组织他们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排斥在外，比如说在巴黎会议之前，有好多非政府组织比如环境组织，他们都做了很多的抗议，甚至有一点暴力，或者说过于激进的一些活动。但是在《巴黎协

定》之前，出现了一个恐怖袭击，结果在巴黎就是进行了宵禁，所以这些非政府组织当时就是什么样的活动都组织不了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您觉得非政府组织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呢。

Jo Tyndall: 肯定是。他们对于整个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在特设工作组我们也在寻找方法，来确保我们的会议都对于观察员是开放的，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我们才会进行闭门会议，不允许观察员参与。他们确实是这整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必须要对他们进行管理。我们也需要留一定的空间给谈判方。让他们自己去谈判。在有些情况下这是必须的。否则的话，就很难让人们去真正地进行代表国家这种谈判，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安全感。比如说他接受你的提议，或者说他接受这样的一个提议，如果没有这种安全感的话他可能就会非常的勉强。如果出现了这种媒体或者是非政府组织在场的话他们就没有这种安全感。

齐晔: 能不能讲几个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您觉得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呢？

Jo Tyndall: 我觉得我就不去具体指出到底是哪些组织了，确实有不少国际组织他们在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分支，他们在国内还有在正式谈判上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那么我们两个 APA 的联合主席还有过去新西兰前任气候变化大使一直都希望和他们进行会面定期的会面，他们都是这个正式谈判当中重要的利益相关方。

齐晔: 张教授，其实您非常适合回答这个问题，还有之前那个问题。

张海滨: 次国家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我想说的就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同样重要，这些次国家组织和中央政府是不是一样重要呢？我们并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你们可能也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在这几个月我也做出了很多努力，尝试联系，负责这个北京和这种加州之间的气候变化工作组的人士，还有深圳和加州的气候变化工作组的人员，他是去年成立的。他们告诉我说，我们不得不停止，是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国家级别的合作就停了。而城际也就是城市对城市的合作，是基于战略对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特朗普不喜欢和中国进行气候变化合作，所以他们停掉了政府级别的，政府间的和城市间的气候变化的合作，这是非常令人伤心的。我觉得国

家政府比次国家的参与者更重要，尽管次国家参与者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对气候变化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非常满意，但是事实是如果没有协调性，不同的参与者，或者是利益相关方之间，比如说政府间，政府、企业界和公民之间的协调一致这种工作的话，就会有重复工作和竞争，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这是我们谈到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挑战，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也就是这种协调一致性。

齐晔：那么我们说希望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多元的声音，是不是您所期待的。

张海滨：是的。

问题 3：感谢齐教授，我是来自澳门澳亚卫视的记者，是媒体记者，我想问一下大使女士，因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峰会马上就要在中国澳门召开，刚刚大使女士特别讲到关于南南合作相关的情况，想问一下大使女士在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怎么样来应对气候变化，他们在落实《巴黎协定》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机制可以进行促进，特别是类似像金砖国家合作会议这样的机制跟巴黎协定之间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有机结合？

齐晔：2015年，中国投入了33亿美元到南南合作的机制，今年中国也主办了“一带一路”的峰会，习近平主席也宣布中国会新增十亿美元进入到南南合作领域来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那么您如何来看待全球范围内的南南合作对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作用？

Jo Tyndall：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而且是令人鼓舞的。我们看到南南合作它的影响是在发展，而中国毫无疑问是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背景下，目前对于南南合作方面的进展汇报是自愿性的，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参与南南合作的国家，他们也在谈自己在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公约方面的一些做法，我觉得是值得庆祝的。

张海滨：在目前这个阶段金砖国家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美国对于《巴黎协定》的这种支持，金砖国家的作用就凸现出来了。我觉得这四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他们都是金砖五国的成员，那么俄罗斯他不是积极地参与这种气候谈判。如果我说错呢，您可以纠正我的。我

的建议就是如果我们展望气候谈判的未来和气候治理的未来的话，美国的退出意味着特朗普不愿意发挥主导作用，那么主导是谁呢？其实谁主导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推动整个议程的实现向着实现气候治理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需要新的领导力。欧盟还是金砖国家，我们应该合作来弥补美国退出带来的影响，来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这是我的观点。

齐晔：那么对于领导力的讨论以及新的主导力量的产生，谁来主导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性的谈判，以及南南合作的作用，我们想听听大使的意见，您刚才也谈到了这种进展汇报是自愿的，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南南合作不是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官方认可的途径。

Jo Tyndall：是的。

齐晔：它并不是官方认定的途径之一，我的这个问题是和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观点是相关的，我们知道一方面共识在加强，也就是联合国主导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行动的共识，另外一方面就是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局势越来越严峻。所以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挑战，也就是我们要思考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变化的工作是不是行得通，是不是能够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缺失的那一块是什么？我们是需要思考的，这是我对两位专家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应该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思路，联合国主导的思路，已经有 25 年的时间了，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它是不是行得通呢，是不是有效呢？如果无效的话，我们缺失的是哪一块呢？我想首先请大使回应一下。

Jo Tyndall：因为 UNFCCC 是 1992 年诞生的，《巴黎协定》也就是一年多的历史，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些时间，《巴黎协定》它的新鲜之处就是为所有人提供了一种选项来采取共同的行动。但是我们知道各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巴黎协定》是超越了这种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差异，它是希望能够解决我们共同应对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一种态度。我们在谈新型的领导力的话，也谈到了联合国主导的行动，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还有谈判中也有不同的立场，可能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要填补领导力的真空，我们需要有不同的思路来思考领导力。我们应该找到我们之间的共性，并且要有一致的目标，而不是过渡地强调差异。

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我们有了《巴黎协定》，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径，也就是共同但有差异的责任，以及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各国的特点，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并且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来实现既定目标。

张海滨：就我来看 UNFCCC、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也就是说都是这种联合国主导的多边行动倡议，联合国它应该是比任何国家和国际机构都有权威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来抛弃联合国主导的体系来选择其他的路径，联合国主导的多边的气候变化的机制应该是一个基础，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来改进，而不是改变，不是说如何替代联合国。当然我并不是说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它确实是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关注点应该是如何来改进联合国主导的体制，而不是如何来替代联合国。我觉得有三个核心的观点，或者三个概念很重要。第一是领导力，不管你如何界定领导力，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国际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主导力量的话，那他注定是失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领导力。第二点，就是一致性。我们说这种多边的体系是不能够抛弃的，但是我们如何来进行很好的协调，来避免重复性的工作，或者是对于有限资源的竞争，这是很重要的。第三点，关键词就是创新，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方面的创新。当然可以有一个很长的清单，但是这三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向前发展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谢谢。

齐晔：我也很高兴有一些中学生参加了今天的活动，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这里，我看看这边有人举手了。我们请某个同学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来提问题吧，因为你们非常重要，我们这儿讨论的问题其实是和大家的未来有关的。根据《巴黎协定》到了你们的孩子，大家都会有小孩的，你们的孩子将会看到化石燃料时代的终结，那我是看不到了。但是你们的孩子会看到。

问题 4：我非常高兴听到我们对于化石燃料时代的终结，感到非常的高兴。我们是参加 ENDP（音）的一个夏令营，参加了潘德格林市协办的，我们去了山西，看一看就是作为社会公民来说可以做出哪些改进，作为气候变化的领导者说，你觉得我们这一代有什么机会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可以采取什么步骤？

齐晔：好，我想把这个问题再提给你们大家，你们觉得自己作为中学生展望未来得时候，能够做什么。

问题 4：是的，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我们来到北京是作为一个小组，然后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我们在这儿学到的东西来回到自己各自的学校。我们学校是有这种公共关系的会议，我们希望能够和自己身边的孩子同学进行交流，基于他们更多的力量和支持，所以这是我们做到的。

齐晔：好，我们听一下专家的意见。

Jo Tyndall：这听起来确实是具有启发性，非常好。也感谢你们今天抽出时间来到这里。我觉得确实有一些是个人可以做的。比如说自己的生活方式，交通，消费选择，所以个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一直认为大家要向政治家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者说发出信息，这很重要。当然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鼓励他们，而不是说去指责，而是要鼓励政府不断地去做出正确的决定，要确保他们沿着正确的方向走。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说你常常指责政府呢，那么就很可能带来这种消极的结果，但是鼓励的话，比如说我知道我们现在做的还是不够，但是我们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如果你的态度是这样的就可以带来更好的进展。

齐晔：就是少指责，多鼓励。

张海滨：我非常兴奋听到你的回答，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一个印象。就是我觉得未来气候变化的结果掌握在青年人的手里。

问题 5：我叫程倩。我非常感谢齐教授谈到了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那么我对两位嘉宾都有问题，就是想问一下两位，你们觉得即将在波恩举行的 COP23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为提到了 APA 2018 年就要到工作的一个截止日期了，所以现在必须要尽快能够取得成果，所以你们觉得这个 COP23 会议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同时我还想知道就是你觉得巴黎协议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个回顾或者是审查的制度，那么在哥本哈根的时候实际上就对这个问题各国有很多的辩论。

齐晔：我想问一下你对于现在进展是不是满意呢？

问题 5: 我个人的观点认为我们离升温 1.5 摄氏度的目标还差的太远。现在 NDC 如果我们简单的算一下的话，像张教授所说的，我们其实离《巴黎协定》治理目标还离的太远。

问题 6: 非常感谢，我来自于北京大学，我的问题和 Tyndall 大使，还有张教授所讲的有关系。就是美国退出了，但是这是到 2020 年，才会正式生效，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机制，有人说撤出了很多其他的承诺，那这些不一定就会失效，我想就是对于他们，美国对于发展中国家所作出其他的这些资金承诺，你觉得会不会说在 COP23，或者 COP24 次会议上面对这些问题会有进一步的谈判，会重新调整呢？那么比如说想缓解这一块中国在 2020 就会对可再生能源投资六百亿，但是还有就是像东南亚国家他们要进行缓解，就是因为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那么怎样确保呢，真正这些拿出来的资金能够真正帮到这些发展中国家。我想张教授可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些承诺都是自愿做出的，《巴黎协定》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些承诺，所以如果你不履行承诺也不会因此而被问责，所以我们怎么样保证作出承诺的国家真正能够履行承诺。

齐晔: 我觉得我们已经讨论完前的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又出现的，好两个问题，我想我们还是从张教授开始。

张海滨: 我想还是先从您讲的气候变化融资这个问题谈起，个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很困难的问题。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在谈判里面，发达国家，根据他们的承诺，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他们承诺要出资帮助发展中国家，但是实际上因为 CBDR 等等这些原则，他们是应该这样做的。有些人现在也理解了比如说像一些发达国家，像欧盟，他们本身还经历了不同的危机，比如说像恐袭，还有英国脱欧的谈判等等。这实际上分散了他们对于气候变化的注意力。我们看到就是需要，就是他们要帮助发展中国家这种政治意愿也相应的被分散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糟糕的，更糟糕的一点就是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那么就出现了一个融资上面的真空，谁来填补这个真空。当然我们会讨论发达国家一起来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但是实际上其实很难，那因此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并不是说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完美的方法，我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去吸引企业私营部门，让他们能够参与到谈判过程中，这可能是一个方

法。但是现在坦白来讲我还没看到有特别好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没准大使女士有自己的想法。

Jo Tyndall: 我就非常简短的来回应一下。我觉得不应该夸大问题，在现在其实一千亿里边只有 20 亿的缺口，所以这缺口并不是特别大，并不是说就填不上。有其他一些办法来补上这个缺口，还有另外一点我要说的是，你要制定有约束力的融资上面的一些义务，并不一定就能够保证结果更好。或者说即使有约束力他也不一定就比完全依靠各国的这种真诚善意解决就要好。而且他还会使很多人望而却步了，那我还想就是回应一下到底对于 COP23 来说怎么样才是一个成功的会议，从新西兰来说很重要的就是对于新西兰来说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斐济的总统将会在波恩担任会议的主席，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就表明了处理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从特设工作组的角度来看，觉得 COP23 会议会成功的，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计划完成谈判，能够在明年年底之前完成谈判，实现目标。但是我们说我们是希望能够进行这种具有建设性的讨论谈判，因为大家都在寻找的是一种脚踏实地的非常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果说没有一个 COP 开始之前的这种指南的草案的话，那么就得根据 COP 召开之后，大家在 COP 上面所提出的建议来草拟一个草案，我想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会使 COP23 成为成功的一次会议。那么能够使得 2018 的会议成为一个成功的，按照计划来进行的高级别会议。而且最终能够在 COP 上面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行动，还有像非政府组织，还有次国家组织，也要积极地广泛地参与进来。

齐晔: 好，我们说关于钱的问题，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说现在只有 20 亿美元的缺口，那么就一千亿万美元来说这是一个很小的缺口，我们已经有 980 亿美元已经是差不多了。

张海滨: 我想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这是秘书长的最新的报告，他谈到了这是我自己的观点。我们来看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缺口还很大。

齐晔: 您先给我们提出一些数字，比如刚才大使女士先给了我们数字。

张海滨: 那么到 2020 年发达国家应该提供一千亿美元，现在只有 10 亿美元。

齐晔: 所以我们现在是 20 亿美元的缺口和 990 亿美元的缺口。

Jo Tyndall: 我不知道十亿美元意味着什么？很多公共部门的这个筹资，每年都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到整个基金池里面，而且非公立部门的筹资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不知道您刚刚说的十亿美元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一种解读。

齐晔: 我觉得我们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那大使女士您能不能谈一谈主要的这个贡献方您了解的都是哪些呢？就是 980 亿美元之中的主要贡献方，捐赠方。

Jo Tyndall: 日本政府、欧盟的所有成员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瑞士、挪威确实有很多的发达国家他们是会为全球气候基金筹资的，而且还有一些多边的银行、世行、亚投行还有一些区域性的开发银行。他们也加入进来。还有私人部门的参与。

齐晔: 所以我们要重新考虑一下他的定义。现在我们的定义肯定有很大的差异。

张海滨: 我想再说第二句话。谢谢您把这个报告带给我们，其实大使女士说的对，这是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的不同的定义。解振华也在不断地强调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来看待 COP23 会议的成功，因为 2017 年 11 月份将会在波恩召开这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的重点会是什么？

齐晔: 这是关键的会议，那么大使女士您如何来看待美国的一个角色呢？

Jo Tyndall: 我们听到美国会仍旧参与，并且派代表团参加波恩的会议，是令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个信息。那么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不是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使得美国愿意回到谈判桌前，或者来参与，不是吗。实际上这是美国政府单方面的决定，他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决定。

齐晔: 但是我在想我们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会议，我肯定是要努力的来拉他进来。

Jo Tyndall: 确实我刚才也谈到了美国是敞开大门的，他说是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下来进入到气候变化的谈判的，这是他们的主权国家的一个独立做出的决定。我觉得其他的机构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的缔约国当然会欢迎这样的态度。但是这是美国自己的决定，他们是不是在未来会重新进入到气候变化的谈判。

问题 6: 我也是来自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我的问题是刚才谈到了次国家机构的作用，张教授也谈到了创新的重要性，我的问题是现在对于各个国家让私营部门参与到气候变化的减缓，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技术创新方面，各国政府有什么样的办法。对于大使女士的问题是您是谈到了私营部门的作用，还有明年是对于整个气候变化谈判是关键的一年，您如何回应。

问题 7: 谢谢齐教授、张教授，大家下午好！我想问大使女士一个问题，因为时间有限，您能不能大概地来谈一谈您期待联合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就是 2014 年到 2015 年联合国的这些倡议，您如何来评价，您认为国际干预是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近期的一些问题，尤其使得我们的协定能够步入正轨，沿着正确的轨道来发展。不管美国下一任总统是不是特朗普，还是其他的人。我认为以后的还能不能进行一个关键的作用，不管是哪个总统，或者是哪个退出《巴黎协定》，来促使能够向好的方面去发展，我觉得是否是一个基础性的机制。

齐晔: 所以他是对联合国的作用持怀疑态度的，我觉得，两个问题，分别给两位专家。

Jo Tyndall: 我觉得联合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如果政府看到其他人都在采取措施，那么它肯定也更容易的，或者更愿意在本国推动相关的行动，不管你认为联合国是不是高效，或者是他的野心，或者说它的抱负足够大，这是不同类型的问题，但是我们都希望提高效率。但是现在的事实是我们有了一个全球性的协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有各国的政府，他们面临着在短期内进行更迭的挑战，而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视角，所以我觉得联合国在这方面是有很大的价值的。联合国一直在这里能够给我们注入信心，并且他会一直采取这种长远的视角，对于特设工作组和 NGO 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来说，这不是 APA 的议事日程之一，我们确实有一个下属机构是关于协定执行的。那么他们会考虑到私营部门和 NGO 的作用。

张海滨: 谢谢，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来回答您的问题，您有没有其他替代方式来代替联合国？没有。所以，我刚才也谈到了联合国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有 193 个成员国，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间的机构，、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平台、来实现多边的目标。还有一

个原因是时间不够了。我们看看数字，我们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不能够再建立一个新的机制了。因为建立新的机构是要耗时耗力的，我们是承担不起这个后果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改进联合国，而不是要替代联合国。对于您刚才提到的问题，我的看法是 PPP 公私合营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可以考虑不同国家的特点。在中国来说政府是核心的地位，这是最重要的。同时企业的作用会逐渐的提升，这是中国推广清洁技术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一个主要的模式，就是通过 PPP。

齐晔：我非常喜欢您的这种回答问题的策略。您通过提问来回答问题，我也经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孩子们的一些抱怨，他们对我不满意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你有别的选项吗？我觉得我们可以沿着这个问题再推进一步。这不一定是我的观点，但是我想说，有的人会说，我们考虑所有的因素，中国、美国、欧盟、新西兰，他们的排放占到全球排放的 60% 了吧，毫无疑问，这几个国家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来进行减排和气候减缓方面的努力，但是他们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来的，比如美国减排，二氧化碳减排主要的因素就是用天然气替代煤，那么中国是另一个例子，它主要的因素是节能减排，主要是为了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是在十一五期间对于“十二五”计划来说，能源效率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也是在提高的。但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解决能源短缺和气候空气污染的问题。那么对于 EU 来说，欧盟来说，有 28 个成员国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来进行减排，他们从中国和其他国家进口产品能够减少在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比如像俄罗斯，使用俄罗斯和中东的天然气能源来替代等等，如果这样的话很多人会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变化的行动呢？就让世界找到自己的方法就好了。我是想要把它讲的比较极端一点，这是大家的反馈是什么样的？大使女士。

Jo Tyndall：我想首先就是如果政策决定或者说投资决定是出于其他原因做出的，但是同时也能够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那我们就应该反对这些决策，而是应该欢迎他们，因为有很多的这种理由，可以帮助政府做出这个有利于气候变化的决策，这又何乐而不为。我想第二点就是需要政策的协调一致，有的时候你说我们先不管气候变化，它爱怎样怎样，这样的情况就不会有政策

的一致性，必须要有政府里面的不同部门，还有这种私营部门里的不同部门彼此在这种进行争斗，而是应当尽可能地协调他们。

齐晔：我想这个是和您刚才讲的观点是一致的。那么张教授觉得这可能也应该是具有一点挑战性的。引人深思的一个问题。

张海滨：其实您是说的中国还是全世界的问题呢？

齐晔：我所讲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对，如果是对的话，那我们又为什么需要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变化的工作呢，因为它要额外花很多精力和时间。

张海滨：当然我们应当看一看科学界的结论，科学家指出气候变化非常严肃。

齐晔：我们也是说要开发清洁能源应对空气污染。

张海滨：实际上这个领域已经达成全球一致，我们就应该沿这个方向走。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气候变化）？你不是科学家，不是气候变化的专家，你怎么知道全球变暖是真的。然后气候变暖是有人类行为所造成的，其实有很多人挑战我这个观点，很多人对我写的文章提出了质疑，我很同情您。实际上我的工作是属于 APCC 报告里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因此我经常被人这么问，我想我认为相信气候变化要比否认气候变化的风险更低，因为大部分的自然科学家都已经认可了气候变化告诉我们这个结论，就好像你去医院，如果要做手术，这是一个大手术，是涉及到生死的，所以你要去咨询医生，你自己是做不了解决的，所以你和这些所有的顶尖的北京医生都去找他们去咨询他们的意见，可能十个里边有六七个人都说，张教授，你需要做手术，那我就去做，可能他们的观点是错的，但是我也不会后悔，因为这是我们最审慎的一切决定，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还有政治家来说，他们都讲说我们现在要这么去做了，那无论我们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如果你不去做，不去应对气候变化，你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Jo Tyndall：我想现在是十个里边有九个医生都会告诉你你要做手术，就是这样一个比例。一百个医生里边有 99 个都会这么说了。

齐晔：我看到两个小时之后依然还有很多观众举手，我知道大家有很多问题，但是很抱歉已经我们超时五分钟了。我想感谢大家非常活跃地参与了和两位嘉宾，特别是和 Jo Tyndall 大使一起进行的讨论，非常感谢。